

上海瑞金医院功能神经外科中心主任孙伯民，是这个项目的主导者。第一批临床试验者经过严格挑选，在上百人里，最终只有26名合格。孙伯民说，他们都是重度抑郁，吃过很多药都无效，患病时间在两年以上，有自杀倾向或者尝试过自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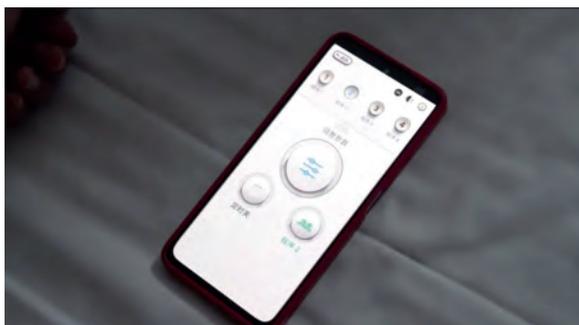
孙伯民觉得，在医学领域，精神科的进步相对缓慢，主要因为其他疾病都可以在动物模型上操作，比如肿瘤、心脏病。“但人的情感、情绪，不是动物所具有的，对于较重的抑郁症，如果药物已经不起作用，只能进行有创的干预。”

困兽与悬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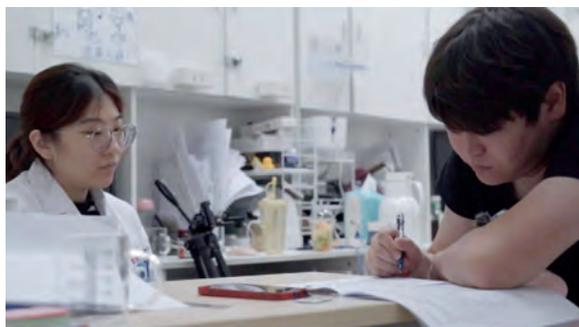
手术前12小时，医生叫吴晓天到办公室谈话，拿起桌上的知情同意书递给他，告知手术中可能存在的风险，包括瘫痪、植物人，甚至是死亡。吴晓天听完内心毫无波澜，抓起笔“唰唰”两下就签了。相比手术的高风险，他更想逃离心底的牢笼。

母亲哭成了泪人，她拽着吴晓天的衣角，哭着求他不要做，说可以养他一辈子。但谎言终究是谎言，吴晓天早就失望透了。上职高那会，吴晓天的病情“彻底黑化”，学校开展留学项目，每天坐大巴车到达指定地点往返培训，紧张的节奏，加上同学嘲笑他“是个傻子”，一度让吴晓天陷入很深的自我怀疑。

他向父母袒露心结，乞求他们扔下来一棵“救命稻草”，哪怕一句简单的安慰，但父母只是轻飘飘地回了一句：“哪个人没有病啊，你就是吃不来苦头。”吴晓天怔住了，



吴晓天可以在手机上调整模式和参数。摄影 / 澎湃新闻 何锴



吴晓天在瑞金医院进行一个月一次的例行复查。摄影 / 澎湃新闻 何锴



吴晓天早上起来调节开关。摄影 / 澎湃新闻 何锴

眼里狂飙出大颗大颗的泪珠。父母是生意人，信运势，责怪他会把财运哭没了，几度到了上手打人的地步。

吴晓天觉得，父母只顾着赚钱，并不爱他，父母为什么不敢面对媒体，因为他们有错，错得太多太离谱了。吴晓天尝试过烧炭和割腕，至今手腕上留着两条淡淡的疤痕，家里地板黑黢黢的一片，也时刻提醒他，自己不好、不配，日子也不好过。那时，他感觉自己像一面脆弱的玻璃，轻轻一碰，就碎了。

横下一条心来上海，吴晓天把手术当成他重生的最后机会。他剃光了头发，带上身份证和病历本，去了瑞金医院。父母主动提出陪同，没有赢得他一分感恩，用吴晓天的话说：“父母只是不想他死。”吴晓天很漠然，在他黑暗的心房里，透进的一丝光亮，也并不来源于父母。

1998年，遭遇洪水那年，吴晓天上小学，消防员把他从家里破旧的房顶，抱到一个洗澡盆里，他用木制棍子划到岸边，意外划水让他觉得“很好玩”；还有一次，夏日傍晚，满天繁星，吴晓天和奶奶坐在树下木凳子上，吃着海螺，聊着天，那是有爱的童年记忆。

在与情绪撕扯的日夜，这些画面，总能带给吴晓天慰藉。

事实上，年少15岁，情绪“困兽”就住进了他的身体。那年，吴晓天随父母从南通搬到苏州，担心同学听到他的家乡话，嘲笑他是“外地人”。每次和同学街上碰面，吴晓天总遮遮掩掩，害怕别人知道他的“秘密”。直到被女同学当面“戳破”，吴晓天开始心慌不安。

之后的16年里，他常常因此感觉脑子不听使唤，说出来的话和想说的话，完全不一样。上职高主修汽修专业参加考试时，他盯着一道简单的题目，大脑宕机无法运转。后来，他的言行越来越反常。有时明明感觉热，从嘴里说出来就变成冷，有时想说开门，却说成关门。同学里有人叫他“傻子”，他也觉得自己傻。

茶几上，吴晓天指着一张照片，那是他七八岁时的记忆，在一个公园里，他爬到一座假山上面，露出